

---

国际

## 抗争退潮后的白罗斯媒体人：当红线再临，新闻如何做下去？（下）

在肃清持续的白罗斯，有媒体人选择留下，写枯燥无味的“软新闻”；也有媒体人选择离开，在相对自由中寻找继续做新闻的可能。



2021年5月29日，波兰有示威声援白罗斯被捕的26岁的“异见记者”罗曼·普罗塔塞维奇（Roman Protasevich）。摄：Beata Zawrzel/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

特约撰稿人 Fiona Chow 发自明斯克 | 2022-01-26

编按] 2020 年夏末，被称为“欧洲最后独裁者”，已在位 26 年的卢卡申科（Aliaksandr Lukashenka）六度胜出白罗斯总统选举，但源源不绝的舞弊指控，触发了白罗斯 30 年来最大型的抗议运动。2021 年抗争退潮后，卢卡申科政权对公民社会的打压愈趋极端，多家国内新、旧媒体首当其冲，逃不过被肃清的命运。红线再临，在甚么都不能报，不敢报的时候，新闻如何做下去？本文作者在 2020 和 2021 年两度造访白罗斯，访问了国内多家媒体和独立记者，勾勒出一幅白罗斯的新闻人群像：即使在卢卡申科政权对记者和新闻机构的不断打压下，也有新闻从业者尝试在极仅有的、狭窄的空间中，继续采访和报道。

本文分（上）、（下）两篇，连续两日刊出。欢迎阅读上篇：[抗争退潮后的白罗斯媒体人：当红线再临，新闻如何做下去？（上）](#)

2021 年 5 月，白罗斯发生一件国际骇闻的劫机事件：一班原定从雅典飞往立陶宛维尔纽斯的航班，被白罗斯要求偏离航道，突降明斯克机场。机上坐著的，是白罗斯民间媒体 Nexta 其中一名创办人，26 岁的“异见记者”[罗曼·普罗塔塞维奇（Roman Protasevich）](#)。客机落地，他被白罗斯当局即时拘捕。

普罗塔塞维奇至今仍被白罗斯当局扣留，并面临至少十年以上的监禁。2021 年 6 月，他在记者会上公开露面并“忏悔认错”。



2021年5月25日，白罗斯民间媒体 Nexta 其中一名创办人，26 岁的“异见记者”罗曼·普罗塔塞维奇（Roman Protasevich）。客

普罗塔塞维奇登机前，跟 Nexta 内的工作伙伴说感到被跟踪和偷拍，他的好友、时任 Nexta 总编辑吉赞（Tadeusz Giczynski）还开玩笑揶揄他。“事实证明，这真的不太好笑”——吉赞万万预计不到，他们即使逃离自己家国，又避开前往任何与卢卡申科关系友好的国家，仍逃不过政权的公然绑架。普罗塔塞维奇被捕的新闻一出，Nexta 便进入外国媒体视野。

Nexta 被卢卡申科政权视为敌人，全因 Nexta 被视作 2020 至 21 年那场示威运动的先锋，靠逾百万人订阅的 Telegram 频道成为民众、以至独立媒体间最快更新新闻的平台。2020 年 8 月 9 日选举日爆发示威，Nexta 发帖号召民众上街，制图指示警察位置、示威者可躲藏的安全地，提供人权律师的联络，又建议民众“翻墙”上网的方法；随后数天，Nexta 发布详细的抗争策略，指引示威者行动。Nexta 订阅人数由是在这段时间翻了十倍以上，最高峰时达 150 万人。

Nexta 崛起却远早于运动爆发前。[《纽约时报》](#)形容年仅 23 岁的创办人普蒂罗（Stepan Putilo）是引领白罗斯示威运动的“北极星”。普蒂罗于 2015 年创办 Nexta 的 Youtube 频道，制作一些嘲讽时政的短片，其后逐渐发展成制作长纪录片，例如揭发卢卡申科如何一步步夺权，累积超过 3 百万浏览次数。2018 年首现 Telegram 频道，开始收集民众匿名提供的线索。

直至 2020 年示威爆发首数天，全国整整封网三天，所有白罗斯独立媒体的网站都被封锁，只得 Nexta 在 Telegram 上平安无事，“那几天，Nexta 就成为全国人民获取、收发新闻的唯一来源。”

吉赞记得，当几百万人转为依赖 Telegram 通讯，普罗塔塞维奇、普蒂罗和他三人在波兰华沙的办公室，每一分钟收到逾 300 个信息，无数白罗斯人报料说哪里有防暴警出没、示威现场照片和描述文字排山倒海。三男不眠不休不洗澡地工作了几天。

接下来的半年，吉赞没有放过一天假，“老婆差点要跟我离婚”，他笑说。年仅 29 岁的吉赞本来是伦敦大学学院 (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) 斯拉夫及东欧研究系的博士生。运动爆发后，他选择休学。

三人数年前被卢卡申科政权打为“极端分子”，从此长年流亡外地。隔著荧幕犹如亲历其境见证自己的国家翻天覆地，而吉赞从没想像过，Nexta 会成为逾一百万人公认的“革命先锋”——Nexta 告诉人民集会地点，整顿大量的报料资料，即时短打转发哪里需要增援、要甚么物资。

更重要的是 Nexta 得到人民信任。运动期间，当某区需要增援时，Nexta 会帮忙将负责人的 Telegram 频道发布，久而久之，白罗斯人就懂得通过 Nexta 来找同路人自组地区群组。



这好像有别一股“媒体”应有的角色，原则上记者不应是参与者。

但吉赞认为原则在失序的社会并不通用。“我们在对抗的政权才是恐怖分子，这些人占据了我们的国家。”所以他即使明知会成为攻击目标，仍然毫不犹豫地坐上总编辑位置。他相信的是，来到这时刻，他要担起角色，就是有手段地策动群众运动；只是他没有料想过，会在 Nexta 内达成这件事。



2020年8月23日，白罗斯明斯克，反政府抗议者在防暴警察前安慰一名祈祷中的妇女。摄：Misha Friedman/Getty Images

## 媒体之外：连结他人的可能性

白罗斯独立媒体的圈子原本小之又小，Nexta 在运动期间崛起，但运动发生前它在国内却名不正言不顺。

“有些‘旧派’认为 Nexta 不是‘正当的新闻’(proper journalism)。”主流媒体的做法始终离不开：获得线索、编辑决定是否跟进、派题予记者、记者查证写稿、编辑改稿这一条固定的生产链，经过反复查证后才发布一条可能不再即时的新闻。Nexta 却不跟从这套运作模式。

吉赞举例说，2020 年初疫情袭来白罗斯时，卢卡申科政府不但没有任何防疫政策，甚至公开否认国家面临公共卫生危机。叫人民去“洗个澡”(俄语：мыться)。与此同时，Nexta 收到在公共医院工作的

临公共卫生危机，时人因云 [Nexta Daliya \(俄式杂手信\)](#) 不困。与此同时，Nexta 收到在公共医院工作的读者提供线索，指医院内部曾发指引确认疫情的存在，但前线员工须三缄其口。

其后，由普通人“吹哨”流出的秘密消息和机密文件愈来愈多，指证官方刻意隐瞒疫情、上级滥权。连在小城小村的人，都用 Nexta 报料地方新闻。“吹哨”声愈来愈响，其他独立媒体也转发从 Nexta 上获取的消息。

准确一点说，是转发从 Nexta 的读者身上获取的消息。但即使有机密文件泄出，当时仍未被逐出白罗斯境内的主流媒体亦不敢报，怕过份惊动政权神经。

Nexta 的角色算不算“堵漏”，做主流媒体做不了的事？吉赞说当时没有这意图，但 Nexta 的操作模型，肯定是颠覆了主流信息传播的形式。Nexta 本身的名字在白罗斯语解作“Someone”，示意 Nexta 可以是“任何人”，将信息接收和传播的权力，还予人民，任何人都可以决定其他人阅读甚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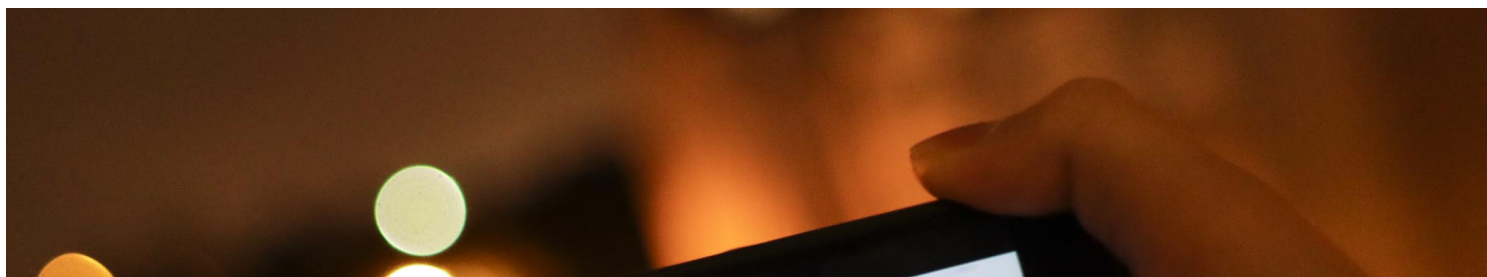
这就惹起传媒工作者的质疑：如何求证消息真伪？吉赞解释说，“只要一则报料有片有图佐证，我们就先转发出去，再配句图片说明，问有没有读者在附近看见，号召其他人一同查证、搜寻线索。”他说，提供线索的读者希望 Nexta 帮他们证明真与假。

真假的界线在行威权统治的国家从来显得模糊。这就如哈维尔说，后极权将意识形态注入日常，令所有人深陷权力结构之中，沦为维持制度的工具——在这样的“auto-totality”，人与人互相监察，也没有人敢偏离官式话语。

以同一逻辑理解后苏联人，就明白在白罗斯的语境下，“活在真相中”并非如此容易。白罗斯读者对 Nexta 的寄望，并不是指向吉赞或编辑部，而是订阅 Nexta 那一百万人：他们想要看见，自己并非唯一站出来的人。

吉赞自己也说，Nexta 并不配得上历史英雄的冠名，“我们没有掀起这场革命，我们只是一直在做对的事，而终于来到一个对的时间，证明我们做对。”

Nexta 空前成功，大概是因为它让白罗斯人看见彼此。







2020 年8月19日，一名男子在白罗斯明斯克的智能手机上观看 Telegram 频道 NEXTA Live，画面上是反政府示威。摄：Sergei Grits/AP/达志影像

## 一个真相的代价

但对抗极权不是人多势众就成事的。

勇于趋近真相有代价。有多大？吉赞说自己好多年没有回家，也不会去那些航线飞越白罗斯上空的国家。他生活在伦敦、华沙，出街从来不戴耳机听音乐，随时保持警戒，又随时预备逃走。“每个人都在这场运动中牺牲太多，其他人比我付出更多。”

他说的其他人，包括向他告密的读者。

有次，他收到一名男子传来一份“内政部”的文件，指警务处长要求保安局调动数千名军人辅助警队镇压示威。这是严重指控，如属实将证明政权彻底违宪。吉赞同“吹哨”的男子，公开这份文件会否对他本人构成危险；男子答应让 Nexta 发布。

翌日，吉赞收到消息，指有名保安局的上尉(captain) 被捕，就是那名前一天提供线索的男子。原来那份文件只有极少数获授权的人才能取得，而且每份副本有辨认标记，当局一找就找到是谁泄出。

吉赞后来得知，“他只有 24、25 岁，还有个两、三岁的孩子和年轻妻子”。男子被判 15 年监禁。“真的后悔，也感到很抱歉”，吉赞说，“但这就是白罗斯的现实。这也是我的工作。”还有其他因告密而被判几年不等的人，吉赞无法一一记得他们的名字，因为实在太多了。

截至 2021 年 11 月，白罗斯监狱内坐了逾 800 名政治犯。即使战战兢兢都要吹哨，一个真相负载的代

价，必然超越自我的重量，才使得这么多人愿意冒险。“是一份希望，他们想知道政府内部发生甚么事，他们想改变国家”。

酝酿一次群众运动用上白罗斯两个十年，运动热情减退，却只花了半年。运动抵不过零下廿度的寒冬，颤动人心的更是政权打压，一一将异见者收监，国内又发生“边境难民”危机(Attach link if possible) 导致运动失焦。卢卡申科没有下台，人民不敢再上街。

Nexta 目前的订阅人数骤跌至约 90 万人。创办人普蒂罗判断运动已走下坡，这时候该“回到”Nexta 的原位，即主战 Youtube 频道，制作新闻节目保留读者群。吉赞毅然辞去了总编辑一职。

Nexta在运动期间崛起，在运动完结后“打回原形”。昙花一现代表失败吗？

吉赞有意或无意，用很巧妙的一句谚语回答：“let the genie out of the bottle(выпустить джина из бутылки)”。精灵一旦放了出来，就回不去了。但首先，还是要有扭开樽盖的人。

Nexta 推动过数以十万计的人自发组织，从此以后，无论再有没有 Nexta，这些连结过的地区频道、人，都会以另一种形式存在。

至少吉赞是这样希望，“未来会证明我是对或错”。





2021年5月25日，波兰有示威反卢卡申科及声援被捕的记者罗曼·普罗塔塞维奇（Roman Protasevich）。摄：Michal Fludra/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

## 白罗斯记者会：为未见未来建桥梁

组织起来的不止民众，还有记者。白罗斯记者会（Press Club Belarus）于 2011 年加入 国际记者会联盟（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ress Clubs;IAPC）。理论上 IAPC 只接纳来自享有新闻自由的民主国家成员，白罗斯能够开先例，全靠资深传媒人尤莉亚（Yuliya Slutsкая）竭力游说，坚持白罗斯应成立记者协会，连系本地独立媒体、国营媒体、外媒及学术界。

尤莉亚 在 2020 年 12 月被捕。2021 年 8 月我在白罗斯采访时她仍然在囚。接任的总监贝里高娃（Natasha Belikova）带整队员工迁往波兰华沙。

白罗斯记者会在首都明斯克的会址，在访问前一天被官方充公。会址立于一幢典型苏联建筑物内，大堂灰灰沉沉，但顶层的白罗斯记者会办公室光净明亮，有宽阔的讲堂、几间会议室配上落地玻璃，彷如进入另一个空间。

白罗斯政权对自由的收放，取决于每五年一次的总统选举，而在 2010 年卢卡申科第四度当选时，引发为时仅一日的街头示威，却令传媒、公民社会团体在随后的几年被长期镇压。原任欧洲电台（白罗斯）总编辑(European Radio for Belarus) 的尤莉亚同年流亡波兰，并于翌年成立 Belarus Focus 信息分析办公室。

尤莉亚在华沙接触到波兰的记者协会，并参与 IAPC 多次的会议。IAPC 规则很明确，成员协会须来自遵守新闻自由、民主原则的国家，但 Yulia 努力游说 IAPC 的执委，若要从根本改变白罗斯媒体生态，就需要建立一个有规模的记者会以作教育、监察、联系等。尤莉亚成功正式替白罗斯记者会注册成为 IAPC 的附属会员，但她本人却等了三年，才得以将属于白罗斯的记者会带回国内。

白罗斯记者会在 2014 年驻扎明斯克，不设会员制，会址位于市中心，开放予团体租借场地、让记者闲时上去聊天。尤莉亚原意是希望缔造一个共享创意空间，来自不同媒体的记者、新媒体及创科初创企业、研究学者等，可以透过记者会作平台，连结其他志同道合的人，不分背景和立场。现任总监贝里高娃指，全白罗斯约有 4000 名传媒工作者，记者会官方网站每月有超过 6000 人点击。

贝里高娃说，记者会由成立初期，就志在打破“党媒”和“独立媒体”，“私营”与“谋利”的鸿沟，“我们从来不是二选一报道的社论，所谓的一二八社论由政府撰写的，不是人民之间。”



个是——儿极端的社会，所有的——儿乃收走由政来促促的，个是人民之间。

在 2015 年至 19 年间，记者会将自己定位为“桥梁”。每月举办公开课，连国营传媒工作者都不时出席有关传媒素养、新媒体科技等题目的课堂。政府部门又会借用记者会的场地，举办官方的“教育”工作坊，例如国家统计局举办年度工作坊，教记者阅读统计报告。

贝里高娃回想，那几年，党媒和独立媒体过了一段蜜月期，“只要不做骂政权、针对卢卡申科的题目，媒体基本上甚么都能说”。那时社会风平浪静，政府开“绿灯”并与民间团体合作，党媒只需制作很少部分意识形态宣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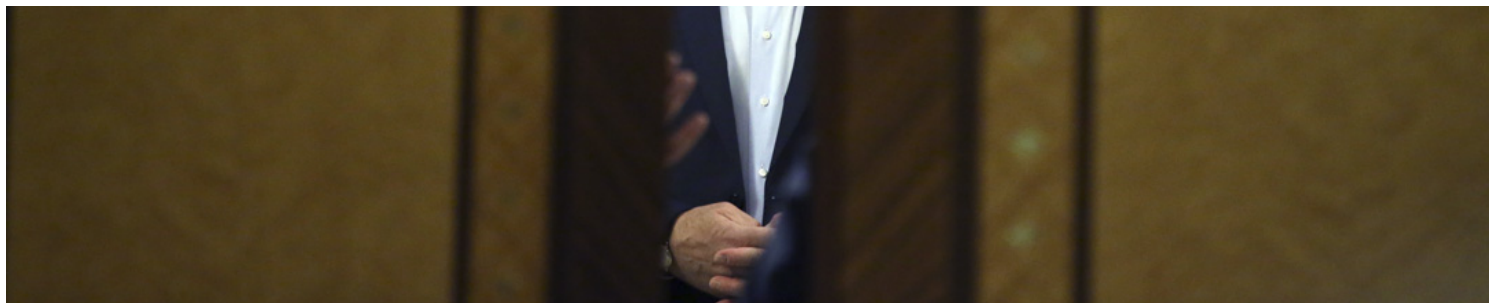
自 2018 年起，记者会开展“LaunchME Hackathon”项目，吸引 6 队来自传媒、科技、商界等多元界别组成的小队参与，集思广益有效传意的新媒体策略。有小队设计了一个互动工具图书馆，其编写的演算法协助网站选取最有效的互动工具，国营机构的网站也同样受惠。

但记者会将本来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人连结一起，并没有令他们能在当局收紧红线时幸免于难。贝里高娃无奈说，“当他们不再顾及社会发展、民生，而只顾巩固权力，就是记者会被打压的开始”。

她形容卢卡申科政权将白罗斯行使“螺旋式操控”，开放与镇压如同两股绳子共扭成结，白罗斯人明白一个组织有多大的自由度，将来也必招致多大程度的严重镇压。2020 年前，卢卡申科政权普遍只针对有政治立场的组织和媒体，记者会从未成为眼中钉。

可是，在威权统治的社会，贝里高娃却知道，“你甚至不会知道甚么时候犯了法”——在不知不觉间，你就成了罪犯，因为极权主义的历史推进过程中，就是需要“罪犯”这样的角色。





2020年2月7日，白罗斯总统亚卢卡申科在俄罗斯出席与普京的会谈。摄：Mikhail Svetlov/Getty Images

## 培养“未见”的媒体

自 2015 年成功立足白罗斯后，记者会已经跟足“游戏规则”，会向一些媒体温馨提示怎样做或会招致打压。小心翼翼为的不过是保存人才。

卢卡申科打为政治犯的人，却大多是国家的精英人才。不只一次听其他受访者说，白罗斯盛产创新科技人才，科技产业是国家收入的中流砥柱。据官方数字，2019 年 IT 业占国内生产总值逾 6 % 以上。

另一边厢，卢卡申科和其内阁却追不上新时代发展，贝里高娃笑说，“我肯定他本人连互联网都不懂上”。她形容这班官僚是苏联时代的旧产物，仍然相信意识形态可以统领人民，难怪卢卡申科只会依靠党媒、电视广播作政治灌输。“他以为自己仍活在领袖说是就是的年代”，所以当人民在网上开始策动运动，官方根本毫不察觉，直至全国各城示威陆续爆发，白罗斯政府才意识到大事不妙。

世界与世界的差别，实指的应该是虚拟与现实两个世界。

因此，记者会早就看到，要培养新闻业的人才，不只限于传统新闻工作者，更重要的是“未见”的未来新血。专题上篇访问的，过被逼离开白罗斯的独立媒体《Nasha Niva》表示，他们寄盼的，是有朝一日容得下有新闻自由的白罗斯。贝里高娃却问得更远：然后呢？你想看见一个后来怎样的社会？谁人，做怎样的新闻？

过去 5 年，媒体学院（Media Academy）成为记者会最重要的项目之一。他们挑战在建制层面上进入学校教育，举办“校园记者”项目，要求学生自组稿题、自创平台，再由行内传媒工作者引导和评选。

贝里高娃直言最初她非常怀疑计划会否成功，因为“学校是全权由政府控制的地方”。甚至，全国只有数间大学设有传理学系，课程不会教学生批判思考、媒体素养等，更遑论在中学教育里学习追源求证、辨明真假。

“校园记者”项目每年吸引约 120 名学生。记者会首生在网上传作宣传，也不敢铺于当地，现怕引起政权注

似四亿有 俄白等十数引约 120 名手工。见有云自儿任网上暗作且反，也个取带八血地，心日引起政伙江意。主动联络的老师，都是“体制内有进步思想”的人。

记者会教学生记者怎样区分“意见”、“事实”，教中学生“不要让媒体成为工具控制你”，而是“你去运用它并达到目的”。有一组的学生活学活用，做了一个教学生阅读 Facebook 的 Tiktok 短片，解释 Facebook 怎样过滤信息，如何区分Facebook上可信的内容。

现在记者会被逼离国，工作坊、公开课那些尚且可以网上举行，媒体学院却只能终止。

2020 年12 月尤莉亚被捕后，贝里高娃Belikova 随即接任署理总监。仅在事发两三个小时后，她便仓促决定带着一行少于 10 人的同事迁离明斯克。

搬到波兰华沙，回到 10 年前尤莉亚的原点。 下一步举步为艰。

一个记者会没了最重要的元素——记者，怎么办？ “我们的新定位不再只是记者协会。”

白罗斯记者会未来打算成为一个海外媒体中心，一方面让有需要联络白罗斯媒体的外国传媒，透过记者会作为中介；另一方面，希望团结流散各地的白罗斯传媒工作者。

即使他们有家归不得，仍能出席记者会继续举办的公开课，即使流散，仍有个契机看见在不同岗位上的同行。

贝里高娃相信，他们能做的是尽力“保存那些仍然愿意为白罗斯改变而付出的人”。因为她不会乐观预想，多少年后可以回白罗斯，她只是相信，“走极权主义的政权不会长久”。







白罗斯独立媒体《Onliner》的摄影记者弗拉德（Vlad）。摄影：Fiona Chow

## 终章：两个记者，一条分岔路

“媒体学院”皆在培养新一代的白罗斯新闻人，尽管在白罗斯做新闻要面对非一般的非难，却是入行前人所共知的。以为独立媒体尚可另辟一片净土，自 2021 年，卢卡申科政权却将非国营媒体打扫得一干二净。留下来的记者，或刚出狱准备离去，或任职“安全认证”的媒体，要不就彻底隐形、不再自称记者。

“究竟如何做下去？”这是所有白罗斯传媒工作者的共同命题。

弗拉德（Vlad）是白罗斯独立媒体《Onliner》的摄影记者。《Onliner》的定位是专注科技产品、汽车和房地产买卖的门户网站。网站吸引许多白罗斯高收入人士浏览，据国营媒体《Belta》“认证”，《Onliner》最大业务之一属电子购物平台“Onliner Catalog”，每月有 20 万以上的用户造访，附属的新闻网站和其他社交媒体帐号，则累计每月逾 2 百万人浏览。弗拉德由写手开始做起，写相机测评、介绍电子产品等，其后跨界当摄记，一做十年。

《Onliner》至今仍然在白罗斯境内畅通营运。

“把新闻写得非常‘枯燥’，写得毫不吸引人”，就是生存之道，弗拉德说。

对《Onliner》整体编采方向来说，却不算是甚么妥协，“由 2001 年创办开始，我们就对写政治不感兴趣”。弗拉德忆说他初入行之时，人民政治冷感，媒体自然不会写政治这些“冷门”题材，“写政治的人都是传媒圈中的边缘”，《Onliner》写科技、电子趋势就很合观众口味。

直至 2020 年 8 月运动开始，《Onliner》大篇幅报导示威，示威者人访、制作纪录片回顾示威活动等，“是因为时机来到，我们不能不写政治”。不只《Onliner》的方向 180 度大变，连弗拉德对待自己工作的态度亦然。

“我一直以为自己为钱而继续做下去。老实说，国内没有其他独立媒体比《Onliner》出更高的人丁”，直至

他一直以来以为自己身处前线做什么。他入狱，白罗斯和其他独立媒体在《Vilniaus》中又同时入狱，且上报导示威期间，他在前线亲身经历警暴，一直以为没有风险的，安逸的工作，突然成为打击目标。他顿悟“原来摄记这工作有相当的社会意义”。

但如果，现实中有这么戏剧性的“敲响革命的钟声”，那么弗拉德怎样回顾以往自己的工作？

“你首先要明白，白罗斯是一个怎样的民族”，就会明白为何出现缄默的几代人，这么多人政治冷感。他用奴隶作喻，主人标签奴隶不仅为了区分，更是为了让奴隶看见彼此为奴，而知道自己属于甚么位置——“大家只想著如何生存，于是没有人想像过改变，因为没有看过‘想改变的人’”。

同样地，2020 年 8 月迄前，弗拉德都不觉得传媒工作有审查，他以前想做的稿题都能做，虽然把矛头指向警察的题目不能做，但他的理解是，“不能写的东西，就是社会不需要的东西”。换言之，他一早接受规矩如是，加上日常采访软新闻的工作又确实不会踩著红线。他回顾前十年自己的传媒工作，实在不算受压。

如今卢卡申科政权将独立媒体打压净尽，若套弗拉德以往“不能写就是不必要写”的逻辑，岂不是社会倒退回不需要自由信息的时代？

弗拉德却说，正因为目睹以前的所谓官方限制，原来在一场群众运动中可以瓦解，“你终于明白那瓦解过程是如何发生，于是你拷问‘为甚么不能做？’”原来只要够多人站起来欲改变那政权，那一切他服从过的规则都会重新编写。就如“奴隶”的比喻，“想改变”是 2020 年 8 月以前没有想像过的事。

推翻以往相信的一切最痛苦。“好像你内在崩溃一样，死了一部分，然后你失去自尊”。

如今他的独立媒体行家在白国内近乎遭到连根拔起，而《Onliner》在 2021 年宣布不再碰政治社会等“硬题目”，退回写软新闻的安全岛上。弗拉德怎样留下来面对他未来的工作？

“我心里有一个钟在倒数。可能现在的政治氛围未轮到攻击我们，但总有一天政府勒下更紧的规矩，我们就不能再工作。”他从收到警示的行家口中听闻，有记者写个黑色幽默，就被 KGB（秘密警察）盯上 警中，警告那记者“你是不是准备好了？”

弗拉德为自己设下的底线，是协助制造假新闻的意识形态机器。如果有一天，政府大肆搜捕在示威现场的医护人员，并要求媒体造谣中伤他们——“这就是我会写信辞职的时候”，他说。

“还未来到这个时刻，我就一直等著。在这里的人民还需要看新闻的。”



2020年9月10日，白罗斯明斯克，抗议者在切尔维亚科娃街变革广场的示威中背对镜头站立。摄：Valery Sharifulin\TASS via Getty Images

## “他们作了选择，而我作了另一个选择”

见到格拉菲娜（Glafira）时，她刚获释一个月。出狱后她去了趟格鲁吉亚散心，访问约在她回国后不久，在市中心空旷的高尔基公园。

格拉菲娜穿一件粉红色大衣、白裤，远看像个搪瓷娃娃。斯拉夫女子打扮精致真的不是传闻而已。

难以想像她在白罗斯骇人听闻的监狱里，同一对袜子穿了 30 天。

格拉菲娜原是白罗斯国立大学（国内排名第一的学府）传理系三年级学生，亦是《Narodnaja Volya》的自由身记者。

2021 年 6 月，格拉菲娜生日前一天预约了去美甲，本来还想穿条好看的裙子，想了想美甲店不过在家附近，还是穿普通裤子好了。幸好，否则当晚她就要穿著裙子挤监仓。



格拉菲娜因现场报道 2021 年 5 月一场学生示威而被捕，并遭白罗斯国立大学开除。，大学一方指她缺席几次重要考试，惟其时她身处监牢内。国际团体 Women in Journalism 联盟发声明声援格拉菲娜，并谴责大学对她无理开除。

在狭小的牢房，格拉菲娜想了很多出去以后要做的事，而不是问自己为甚么会待在这里。“因为本来就知道会是这样（as it happens, so it happens）”，“这样”指的是在白罗斯当记者的艰难。

“其实一进大学就知道，学校是国家的，教授也是领公帑的，他们大多在旧时国营媒体工作，教的是旧时代一套”。好听的说法是“旧时代”，但实指的是“意识形态”容许的唯一一套。

“做功课，任何除政治经济以外的话题都能做，除政治、经济以外的话题，教授都会谈论。”有次研讨会讨论白罗斯与俄罗斯的国际关系，她指国家过份倚赖俄罗斯入口，无法经济独立，又提到俄罗斯以同样手法收编原属乌克兰的克里米亚。这番言论随即引起教授激动地指她“被欧盟的说法洗脑”。

“你只能写一种看法——国家的看法”。在大学里她没有学到媒体素养，没有学到查证事实，“反正国家看法是不需要批判思考的”。她形容传理系的同学对写政治避之则吉，甘于写软故事。

为了脱离大学灌输的一套，格拉菲娜自二年级起就自荐到《Narodnaja Volya》当自由身记者。她知道她只能适应在独立媒体工作。踏入独立媒体记者圈，她才看到其他“很勇敢的人”。

“我认为做传媒不是跟国家、官方作对，我做记者只是想问问题”，格拉菲娜想问的问题，与弗拉德后来发现的问题如出一辙，归根就是“为甚么不能做？”。

答案却难免把矛头指向政权。

如果总结弗拉德在独立媒体十年的工作中明白甚么是“明知不可为而不为之”，那么格拉菲娜就是初生之犊不畏虎，但出师未捷已经触礁。

本来她还在想，毕业后要被指派往国营机构工作两年怎么办（注：白罗斯沿袭苏联教育体制，那批在公开试中的尖子获政府赞助免学费读 5 年大学，但毕业后须依从官方指派，到国营单位工作回馈政府）。现在格拉菲娜则决意离开，“我知道在这里做不下去”，她认为在外面才能做真正的新闻，唯有“写、写、写，直至我们胜利赢吧”。

走笔之时她已经身在乌克兰基辅，遥距就读立陶宛欧洲人文大学（European Humanities University）的传理学系。同时她在白俄罗斯记者协会（Belarusian Association of Journalists）当记者，供稿给各大独立媒体。

她形容自己心不在基辅，“我觉得自己与在基辅生活的人更陌生”，因为她每天处理、接触、对话的，都是白罗斯人民。

她说有些题目在白罗斯境内不是不能写，只是有后果。例如有学生配图向媒体揭发白罗斯国立大学教学大楼修理不善，换取校方回应说，这些地方不预留学生上课用途，又指责“不感恩的学生”散播假消息。目前在外少了顾虑减少，她就放胆写。

状况相当滑稽又无奈——留守记者不能报导的那部分“当地”新闻，就交由在外的记者报导。人在外，反倒更贴近现实。

要写多久才到达格拉菲娜所谓“胜利”的一天？她说很久，可能以 4、5 年起计。

有人得以留守，她却不得不离开，“他们作了选择，而我作了另一个选择”。

弗拉德所说的把新闻写得很枯燥，格拉菲娜认同这是无可厚非的“解决方法”，要留下，就必须改变编采方向，写其他题目吧，例如写动物新闻也很不错。

“既然已经开始了，你就要继续。你要找方法留下来。”格拉菲娜说。